

# 中国佛教简史

郭朋 / 著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HINA



该书是郭朋先生的专著。首次出版于1990年，由于郭朋先生已经去世，20多年来此书一直没有再版。此书的再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该书系统阐释了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数个朝代的佛教概述、传播发展、代表人物、社会影响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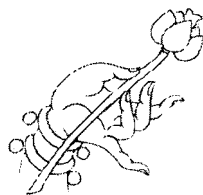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中国佛教简史

郭朋 / 著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简史 / 郭朋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097-2967-0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佛教史—中国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4544号

## 中国佛教简史

---

著 者 / 郭 朋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国际出版分社(010) 59367197

责任编辑 / 赵子光

电子信箱 / guoji@ssap.cn

责任校对 / 李秀军

项目统筹 / 李延玲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8.75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字 数 / 303千字

印 次 /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967-0

定 价 / 5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郭朋著作年表

1. 《隋唐佛教》  
1980年8月山东齐鲁书社出版 452千字
2. 《〈坛经〉对勘》  
1981年6月齐鲁书社出版, 129千字
3. 《宋元佛教》  
1981年8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28千字
4. 《明清佛教》  
1982年12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257千字
5. 《坛经校释》(中国佛教典籍选刊)  
1983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 91千字
6.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  
1986年6月齐鲁书社出版, 619千字
7. 《坛经导读》(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  
1987年5月巴蜀书社出版, 130千字
8. 《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郭朋、廖自力、张新鹰著)  
1989年10月巴蜀书社出版, 250千字
9. 《中国佛教简史》(大学历史丛书)  
1990年4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289千字
10. 《印顺佛学思想研究》  
199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70千字  
1992年11月台湾正闻出版社出版台湾版
11. 《中国佛教史》(中国文化史丛书10)  
1993年7月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
12. 《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中、下卷)  
1994年9月—1995年9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389千字
13. 《太虚思想研究》  
1997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450千字

# 目 录

<b>第一章 汉代佛教</b> .....	1
第一节 佛教的传入 .....	1
第二节 汉代译经 .....	3
第三节 关于《四十二章经》.....	5
第四节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贵族 ——楚王刘英 .....	7
第五节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 ——汉桓帝刘志 .....	10
第六节 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出家僧人 ——严佛调 .....	11
第七节 竺融事佛 .....	12
第八节 从《牟子理惑论》看时人对于佛教的理解 .....	15
<b>第二章 魏晋佛教</b> .....	20
第一节 概述 .....	20
第二节 魏世（三国）译经 .....	21
第三节 昙柯迦罗的来华与中国僧人受戒之始 .....	22
第四节 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兼有佛、儒、道三家思想的译师 ——康僧会 .....	23
第五节 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者 ——朱士行 .....	25
第六节 两晋译经——兼及竺法护 .....	26

## 2 中国佛教简史

第七节 鸠摩罗什及其译经 .....	29
第八节 晋代《般若》学说与六家七宗 .....	33
第九节 释道安 .....	37
第十节 释慧远 .....	40
第十一节 法显求法 .....	45
<b>第三章 南北朝佛教</b> .....	<b>52</b>
第一节 南朝佛教概述 .....	52
第二节 南朝译经 .....	59
第三节 梁武帝与佛教 .....	63
第四节 《三论》学说的再弘传 ——僧朗与法朗 .....	76
第五节 大本《涅槃》的再治与南方的“佛性”说 .....	80
第六节 宋译《楞伽》及其思想 .....	83
第七节 真谛译经与《摄论》师 .....	87
第八节 “夷夏”之辨与神灭、神不灭之争 .....	92
第九节 僧祐与慧皎 .....	98
第十节 北朝佛教概述 .....	104
第十一节 北朝译经 .....	109
第十二节 《十地经论》与《地论》师 .....	111
第十三节 昙无讖与大本《涅槃》 .....	115
第十四节 昙鸾及其净土思想 .....	116
第十五节 北方禅学——佛陀与达磨 .....	117
第十六节 二武灭佛 .....	121
第十七节 南北朝时期佛教律学的弘传 .....	124
<b>第四章 隋唐佛教</b> .....	<b>129</b>
第一节 概述 .....	129
第二节 隋代译经 .....	134
第三节 天台宗 .....	135
第四节 三论宗 .....	151
第五节 三阶教 .....	159

第六节	唐代译经 .....	165
第七节	唯识宗 .....	168
第八节	华严宗 .....	181
第九节	禅宗 .....	191
第十节	律、净土与密宗 .....	200
第十一节	唐武宗灭佛 .....	211
<b>第五章</b>	<b>宋元明清佛教</b> .....	<b>215</b>
第一节	概述 .....	215
第二节	宋代禅宗 .....	222
第三节	宋代天台宗 .....	236
第四节	宋代佛教的其他各宗 .....	246
第五节	元代崇佛 .....	253
第六节	帝师制度 .....	254
第七节	元代汉地佛教简况 .....	257
第八节	明代佛教各宗 .....	261
第九节	清初佛教的两个新贵 .....	279
第十节	清代佛教各宗简况 .....	285

# 第一章 汉代佛教

## 第一节 佛教的传入

佛教，于公元前6～前5世纪间创立于古印度。它的创始人，原是一个小国的王子，姓乔达摩，名悉达多；“成佛”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谓释迦族的圣者）。“佛陀”（觉者）之教，故称“佛教”。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佛教也在不断地演变着：由小乘到大乘，到密教。尽管它的思想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仍然总称之为“佛教”。以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它还发展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性宗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何时传入我国，其说不一。撇开那些无稽之谈以及某些不足征信的附会传说，大体可以认为，佛教的传入，当在两汉之际。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篇末的注中，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浮屠”，就是“佛陀”的早期译语；《浮屠经》，就是佛经。对此，《魏书·释老志》说：“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表明虽然景宪（景卢）从月氏王使伊存那里听受了佛经，但并未受到人们的信仰，所以并未得到传播。按照《魏略·西戎传》（《魏略》，据说共有五十卷，原书已佚）的这一记载（这一记载，不见于《汉书·哀帝纪》），说明西汉哀帝（前6～前1）时，佛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但未受到朝廷的重视，所以并未得到传播）。《魏略》的作者鱼豢，系三国时（魏）人，他的记载，想来该不会是毫无所据的。所以，学术界虽然对于这一记载尚有不同看法，但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这一记载的可信性是存在的。

另据《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的记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



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按：这一记载，也不见于《后汉书·明帝纪》）对此，《魏书·释老志》又加以引申：“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唐人张守节，又把这一记载写进他的《史记·正义》里：“明帝梦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至中国，画形像焉。”（详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大夏……其东南有身毒国”句下《正义》）“汉明感梦”，或系传说，但汉明之世已有佛教，却是公认的史实。当然，佛教的传入，并不一定始于汉明帝时，但在明帝之世，由于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朝廷的重视而能在上层社会得到一定的传播，当属事实。《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里，还有如下的记载：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sup>①</sup>。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因以班示诸国中傅。”这一记载表明，汉明帝永平八年（65）的时候，佛教已在贵族阶层中得到了传播。所谓“伊蒲塞”，乃“优婆塞”的早期译语（以后，玄奘又翻译为“乌婆索迦”），即“男信士”（或“近事男”）之意，一般称之为“男居士”（意谓“居”家学道之“士”，佛教通称之为“居士”），也就是信佛而不出家的男信徒<sup>②</sup>。“桑门”即“沙门”，意谓“勤息”（即所谓“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即

① 根据《后汉书·明帝纪》的记载，明帝下诏入缣赎罪，凡有三次：第一次，在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明帝刘庄于是年二月即位，尚未改元）“十二月甲寅，诏曰：‘……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四，右趾至髡钳城旦春十四，完城旦春至司寇作三匹。’……”第二次，永平“十五年春二月……辛丑……诏亡命自殊死以下赎：死罪缣四十四，右趾至髡钳城旦春十四，完城旦春至司寇作五匹；……”第三次，永平“十八年春三月丁亥，诏曰：‘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以下赎：死罪缣三十四，右趾至髡钳城旦春十四，完城旦至司寇五匹；’……”而永平八年（65），只在“冬十月……丙子”这一条里，有“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这么一句话，却没有“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的具体记载。

② 在俗的女信徒，称做“优婆夷”（“乌婆私迦”），意谓“近事女”，亦即“女信士”，通称之为“女居士”。

出家僧人<sup>①</sup>。

根据上述记载（其他许多更为晚出的增饰、比附之说，姑置勿论），大致可以推定：佛教的传入中国，当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的两汉之际。至于佛教传入的确凿的具体年月，则因文献不足，难下定论。

## 第二节 汉代译经

汉代佛教，处于初传时期，翻译出来的经典，为数还很少。根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以下简称《祐录》）卷二《新集经论录第一》的记载，除《四十二章经》（下详）姑且不计外，桓（147～167）、灵（168～189）之间，总共译出佛经五十三部，七十三卷。其中，安世高翻译的，共“三十四部，凡四十卷”（按：实为三十五部，四十一卷）<sup>②</sup>；支娄迦讖译出的，共“十三部，凡二十七卷”（按：实为十四部，二十七卷）。在这些汉代译经中，多半都是一卷一部的小部头经典。例如，在安世高译出的三十来部经典中，二卷本的只有六部，其余的全是一卷本。在支娄迦讖译出的十几部经典中，除有一部十卷本的《般若道行品经》（或称《道行般若经》）算是汉代译经中卷数最多的之外，其余的，只有四种是二卷本，其他也都是二卷本的。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些译经，多半都是从梵文大本中节抄出来的，而并非独立的经本。例如，在安译佛经中，有十种以上都是从各部《阿含》中节抄出来的。因此，这些译经多半都显得零碎而很不完整。

汉代译师，《祐录》卷十三正式立《传》者三人，即安世高、支娄迦讖和安玄。附见者二人，即严佛调和康孟祥。梁慧皎《高僧传》（以下简称梁《僧传》）卷一《译经上》，除摄摩腾和竺法兰外，正式立《传》者二人，即安清和支讖。附见者六人，即竺佛朔、安玄、严佛调、支曜、康巨和康孟祥。在汉代译师中，在佛教史上影响较大的，则是世高和支讖。安译佛经，禅经较多，所以就成了以后佛教禅学的先驱；支娄迦讖，首译《般若》系经典，所以就成了以后佛教《般若》学的先驱。

① 汉代，朝廷不许华人出家，所以，当时还没有华籍僧人。这里所说的“沙门”，当是指由天竺（印度）、西域地区来华的“梵僧”或“胡僧”。

② 据《祐录》记载，其中，有四部著作（各一卷），道安认为是“似世高撰也”。则世高译经，实则只有三十一部，三十七卷。

下面，且对世高、支谶略作介绍。

安世高，《祐录》卷十三，梁《僧传》卷一《译经上》，均有《传》（《祐录·安世高传》，名列第一）。根据《祐录·安世高传》（梁《僧传》则题为《安清传》）的记载：

安清，字世高，原为安息国的太子。由于深受佛教“苦”、“空”教义的影响而“厌离名器”，所以，他父亲死后，他就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叔父，而自己便“出家修道”去了。由于他出身王族，所以他出家之后仍被人们称之为“安侯”。据说，安世高非常博学，各种典籍以及阴阳五行、医术之类，都非常精通。对于佛教，他不仅“博综经藏”，而且，“讽持禅经，略尽其妙”。可见，安世高乃是一位致力于禅学的人。

他“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于汉桓帝（刘志）初年，来到中国，并“通习华语”。不久，他就开始了译经生活。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到汉灵帝建宁（168～172）年间，二十多年中，安世高共译出佛经三十多部。就其内容说来，世高译经，大体上都是属于小乘禅学系统的。僧祐评价安世高的译经说：“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祐录·安世高传》）僧祐还特别提出：“先后传译，多致谬滥，唯世高出经，为群译之首。”（同上）这种评价，可说是很高的。尽管世高译经，还存在一些艰涩、欠准的情况，但是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真正的第一位译经大师，他的首创之功，确是应予充分肯定的。世高译经，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特别是对于禅学的弘传），都是具有不小影响的。

后来，安世高游方到了会稽（今浙江绍兴），遂死于非命（生卒年不详）<sup>①</sup>。

支娄迦谶，《祐录》卷十三，梁《僧传》卷一《译经上》，均有《传》（《祐录·支谶传》，名列第二）。根据《祐录·支谶传》的记载：

支谶（全称支娄迦谶），原为月支（支，通作“氏”）人。出家之后，“操行淳深，性度开敏，禀持戒法，以精勤著称”。他于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在汉灵帝光和（178～184）、中平（184～189）年间，先后译出佛经十几部。就内容说来，支谶所出，主要属于《般若》系经典。僧祐评价支谶的译经说：“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可

<sup>①</sup> 《祐录·安世高传》：“……遂达会稽，至便人市。正值市有斗者，乱相殴击，误中世高，应时命终。”

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祐录·支谶传》）由于支谶首先译出了《般若》系经典，开了以后《般若》学的先河，所以，在中国佛教史上，支谶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后来，支谶大概离开了洛阳，“不知所终”。

世高、支谶，一个“以汉桓帝之初，始到中夏”；一个于“汉桓帝末，游于洛阳”。两人分别从事了二十几年、十几年的译经事业之后，一个死于非命，一个“不知所终”。两位译经大师的这种结局反映出：在汉代，佛教由于传来还不很久，虽然有一定的传播，但还未受到更大的重视；这些译师，大体上都还处于“客僧”地位，境遇上，远不如以后的知名译师们那么优越。尽管他们都是译经大师，但是，生活上仍然是漂泊无定的（时代的动乱，也可能是使他们的生活不能安定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这，也可以说是时代使然。

### 第三节 关于《四十二章经》

谈到汉代佛教的译经，不能不提及《四十二章经》。

现在通行本的《四十二章经》，署款为“迦叶摩腾并竺法兰共译”。表明这部《四十二章经》是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梵僧共同翻译的。但据梁《僧传》卷一《译经上·摄摩腾传》称：“……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则摩腾之译《四十二章经》，只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同书《竺法兰传》称：“竺法兰……即为翻译……《四十二章经》”。则是竺法兰翻译了《四十二章经》。《祐录》卷二《新集经论录第一》里，著录了《四十二章经》，也提出了是“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但是，同时《祐录》又说：“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这说明，道安所撰的《经录》（已佚），不曾著录《四十二章经》。

由于在译人、译文以及经的某些内容上都还存在着问题，于是，一些学者便认定：《四十二章经》，不是汉代译经，而是后人伪造的。例如，梁启超撰《四十二章经辨伪》，断定此经是三国、两晋间的“伪作”。陈垣同志根据“今《四十二章经》不言‘浮屠’，或‘浮图’，而数言‘佛’”——也就是说，在《四十二章经》里，把“浮屠”、“浮图”这种早期译名，一律正译为“佛”，因此也认为《四十二章经》是

后人伪造的（上引梁、陈论断，统见《胡适论学近著》，平装本第一集卷二《四十二章经考》一文中的引文）。吕澂先生则断定“此经是东晋初抄出的”（详见《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一讲《佛学的初传》）。但是，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四十二章经》是汉代经典，而并非后人的伪作。例如，胡适在其《四十二章经考》一文中，作了大量考证之后，得出结论说：“《四十二章经》有汉译本，似无可疑。”汤用彤先生也认为《四十二章经》不是伪作，并也作了大量考证。汤老的结论是：“《四十二章经》，汉晋间有不同之异本，观上所列，甚可置信。译出既不只一次，则其源出西土，非中华所造，益了然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第一分第三章《〈四十二章经〉考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关于《安录》未曾著录《四十二章经》这一点，汤老也有所说明：“安公治学精严，非亲过眼，则不著录。故自知疑漏者不少。……夫安公之世，《方等》风行，经出更多。《四十二章》，为日常所不备。安公固未见之，遂未著录，或亦意中之事也（又据上文，《安录》判自汉灵之世，《四十二章》出于灵帝之前，故未录也）。”（同上，第25页）任继愈同志也认为：“《四十二章经》虽不能确定译本原著，但恰足以证明它是早期翻译。它是在汉地早期流行的佛经之一。”（《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第156页）作者赞同《四十二章经》不是伪作的看法。其重要史据就是，《后汉书》卷三十《襄楷传》中，记载襄楷在其上汉桓帝疏里，已经引用了《四十二章》的经文<sup>①</sup>；而在《理惑论》里，也明确地提及了《四十二章》的经题<sup>②</sup>。当然，《四十二章经》，确属经抄一类，而非单一经本，是编译<sup>③</sup>，而非翻译。同时，也和其他许多佛经一样，在《四十二章》里，确实也有不少分明是后来加进去的内容。但是，尽管有这种情况，而它并不能影响《四十二章经》确属汉代的一部早期佛经的这一根本史实。

同《四十二章经》颇有一些关系的，还有迦叶摩腾、竺法兰这两位梵僧和洛阳白马寺这所佛寺，也应在这里略兼及之。

摩腾、法兰这两位梵僧，据说是随同汉明帝的使者一起来华的。

① 例如，襄楷疏里说：“浮屠不三宿桑下……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这些，都是属于《四十二章经》里的文字。

② 《理惑论》：“牟子曰：昔孝明皇帝……遣使者……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同时，在《理惑论》里，也有一些引用《四十二章经》文的地方）。

③ 至于这部佛经的编译器究竟是谁，文献不足，难下定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四十二章经》，决不会是摩腾、法兰译出的。

梁《僧传》均为他们立了《传》，而且列为卷一《译经上》的第一、二名。但是，慧皎所据以为为之立《传》的资料，却不外乎是“汉明感梦”之类的传说，并无更多确凿可信的史料。《祐录》卷一《四十二章经》条里，也只是根据同样传说而提到“沙门竺摩腾”，却未提及竺法兰其人。而且，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僧祐为诸译师立《传》时，汉代译师，只有安世高、支娄迦讖、安玄三人（《祐录》卷十三），而只字未及摩腾与法兰。于此可见，摩腾、法兰其人，传说多于史实；否则，僧祐不为他们立《传》这样一种历史情况，就是很难想象的了。

至于白马寺，传统的佛教史上，一向认为，它是为了安置和纪念摩腾、法兰两人用白马驮载佛经来到洛阳这一事件而修建的，也就是《理惑论》所说的“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但其实，这也只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因为正史对此，并无记载。《后汉书》卷五《安帝纪》里，有如下两项记载：“永初二年（108）……五月，旱。丙寅，皇太后（按：即和帝后邓氏）幸洛阳寺”；“六年，五月，旱。戊辰，皇太后幸洛阳寺。”《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纪》里，也有如下项记载：永初“二年夏，京师旱，亲幸洛阳寺录冤狱”。而永初六年“幸洛阳寺”一事，《后纪》里没有记载。但据《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孝宣许皇后传》里的颜师古注：“寺者，掖庭之官舍。”则在汉代，寺，还只是一种“官舍”，而并非宗教场所。和帝后邓氏所“幸”的“洛阳寺”，究竟是佛寺还是“官舍”，不得而知。如果是“官舍”，那同宗教自无关系；如系佛寺，那也只是表明：这是关于佛寺的最早记载；明帝之世，显然还不会有佛教寺院的修建。至于保存至今的洛阳白马寺，虽属佛教最早寺院，但它也决不会像佛教的传统说法那样，真的就是修建于汉明帝时；它只能是在“汉明感梦”、“白马驮经”这些神话传说广泛地传开以后的产物，而不会更早。

#### 第四节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贵族 ——楚王刘英

由于佛教开始时是通过官方的渠道传入中国的，所以佛教在传入的初期，主要的传播范围，只是在上层社会，而且是当作一种方术被

接受的。而楚王刘英，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仰佛教的皇家贵族。

据《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的记载：刘英，“以建武十五年封为楚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因为其“母许氏无宠，故英国最贫小”。但明帝刘庄“为太子时，英常独归附太子”，故“太子特亲爱之。及即位，数受赏赐”。表明刘英因他的母亲“无宠”未能受到他父亲刘秀的喜爱；但又因他同刘庄的关系较好，所以明帝即位后他又能“数受赏赐”。

《楚王英传》说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贵族而“好游侠”，说明刘英这位亲王，从小就是不那么安分的。他“晚节更喜黄老”，还“学为浮屠，斋戒祭祀”。“黄老”，西汉文、景之世曾为显学；以后，随着神仙方术的流行，黄老之学仍具有很大影响。少年时代“好游侠”的刘英，到了“晚节”，要学而为善了，于是就“更喜黄老”。在当时的社会风尚说来，这也可说是一种自然之势。所不同的，是刘英在“更喜黄老”的同时，还“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浮屠”，就是佛陀<sup>①</sup>；这里，当是指佛教而言。“斋戒”，是佛教所讲究的。这里所谓的“斋”，并不是指吃素<sup>②</sup>，而是同“戒”连在一起的，亦即通常所谓的“八关斋戒”<sup>③</sup>，这是未出家的在俗信徒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所受的一种规戒。“祭祀”，可就显示出时代特征了：当时，传入中国还为时不久的佛教，也被看成是一种方术；而佛陀，则被看做是能够福佑于人的一种神祇。所以，刘英信奉佛教，不但要受“斋戒”，而且还要行“祭祀”。在上述汉明帝答复刘英的退赎诏文里所谓“尚浮屠之仁祠”——视佛教为“仁祠”，也正是这种时代特征的反映。刘英信佛，看来主要也是为了祈求福佑。在上

- 
- ① 佛陀，义为“觉者”，略有三义：1.“自觉”，即自己已经觉悟了佛教所认为的“真理”；2.“觉他”，即以自己所觉悟到的“真理”，即佛教教义，去教化“众生”；3.“觉行圆满”，即“自觉”、“觉他”的功行，都已“圆满”成就。佛陀，特指释主，泛指诸佛；这里，主要是指释迦牟尼佛。
- ② 传统佛教，并不主张吃素（所以，现在东南亚各国以及日本的僧俗佛教徒都是吃荤的；我国藏、蒙、傣等民族的僧俗佛教徒，也都是吃荤的）。我国汉族佛教徒的吃素习惯，是从梁武帝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前，汉族佛教徒也是吃荤的）。
- ③ 八关斋戒是：1. 不杀；2. 不盗；3. 不淫（这里的“不淫”，不光是指不能乱搞男女关系的“不邪淫”，而且，连夫妻之间的性行为也在禁止之列）；4. 不妄语；5. 不饮酒；6. 不坐高、广、大床；7. 不着香花鬘，不香油涂身；8. 不歌舞唱伎，不故往观听。——以上八项为“戒”。再加9. 过午不食（过了中午不再吃饭）。这一条为“斋”。说是“八关斋戒”，实则戒、斋合计，共有九条。“关”者，禁闭义。意谓受此斋戒，即能禁闭一切过恶。在俗信徒受此斋戒（“八关斋戒”，是专为在俗信徒而设的），一般以一昼夜为期，也有长达七天、半月的。

述汉明帝的诏文里，还有“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的话，这不仅表明：当时已有“斋僧”的风气；而且也表明：少年时代就好“交通宾客”的刘英，虽然到了“晚节”，却仍然未能改变这种作风。所以，当时尚属时髦人物的“伊蒲塞”（优婆塞——男居士）以及外籍“桑门”（沙门——来自天竺、西域的僧人）之流，便都成了他的座上客，而他也常以“盛饌”来款待他们。所以，刘英之结交当时为数还不是很的一些居士、和尚者流，正表明了他的那种喜欢“交通宾客”的旧习未改。而在他接到了明帝的退赎诏文之后，遂又“大交通方士”，并且“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后汉书·楚王英传》）。正是因为他虽然已到“晚节”，却仍喜欢“交通宾客”，所以终因此而致祸。

就在刘英接到明帝退赎诏文的五年之后，永平十三年（70），即有人告发他“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滑，造作图讖，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明年，英至丹阳，自杀。立三十三年，国除”（同上）。这一事件，不仅刘英本人身受其害，而且株连很多：“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计。”（同上）关于这一事件，《后汉书·明帝纪》里也有记载：永平十三年，“十一月，楚王英谋反，废，国除，迁于泾县，所连及死、徙者数千人”。受牵连而或死或徙的，不是“以千计”，而是“数千人”。可见其株连之广。《后汉书·天文志中》里，也记载了这一事件：永平“十三年……十二月，楚王英与颜忠等造作妖[书]谋反，事觉，英自杀，忠等皆伏诛”。所记月份，同《明帝纪》的记载（十一月）相差一个月（《楚王英传》里，则未记具体月份），但所记事件的性质是相同的。

刘英的“更喜黄老”，“学为浮屠”，原是为了祈求神、佛庇佑的，结果，却并未能因此而免除灾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亲贵族——楚王刘英，即使他把佛也视为神祇而进行“祭祀”，到头来，还是没有能够使他得到佛的保佑而逃脱厄运。



## 第五节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 ——汉桓帝刘志

刘备同诸葛亮谈论两汉兴废的往事时“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的那位“亲小人、远贤臣”因而招致后汉“倾颓”<sup>①</sup>的汉桓帝刘志，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封建皇帝。

桓帝刘志，以宗室身份，继皇帝位<sup>②</sup>，即史书所谓“桓自宗支，越躋天祿”（《后汉书·桓帝纪·赞》）。在位凡二十一年（147～167）。

桓帝信用宦官，致使“五邪嗣虐，流衍四方”（《后汉书·桓帝纪·论》），终于“权移五幸”（《后汉书·桓帝纪·赞》），倾危汉室。他“即位以来，频行诛伐”；“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后汉书·襄楷传》）由于滥杀无辜，所以“死者多非其罪”，致使“魂神冤结，无所归诉，淫厉疾疫，自此而起”（同上）。就是这么一个既昏庸又凶残的皇帝，居然也要赶时髦而信奉佛教。他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同上），“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后汉书·桓帝纪·论》）。

佛、老并祠，表明到了桓帝之世，佛教仍被看做是一种方术，而佛，也只不过是一种神祇而已（老子虽然并不是神，但其时也被神化了）。桓帝并祠佛、老，史家说他是“斯将所谓‘听于神’乎？！”（同上）对于这句话，李贤注引《左传》说：“国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表明桓帝不过是一个国家“将亡”的皇帝，所以他不能“听于人”，而要“听于神”。襄楷在其《上桓帝疏》里，也曾经指出桓帝幻想“听于神”的虚妄：“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后汉书·襄楷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表明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佛、道原是一样的。佛、老同是神祇，而佛、道也同是讲究“清虚”、“无为”的。真可谓其“神”同、其“教”同了。桓帝

① 见诸葛亮《前出师表》。

② 年仅九岁的小儿皇帝——汉质帝（刘缵），被外戚梁冀鸩杀后，太后梁氏（顺帝皇后，时为太后）同其兄、大将军梁冀合谋，策立蠡吾侯刘翼之子、年方十五岁的刘志入继帝位，是为桓帝。